

叶辛谈创作

叶辛 著



学林出版社

叶辛谈创作

叶辛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辛谈创作 / 叶辛著 . ···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

1999.10

ISBN 7 - 80616 - 729 - 3

I .. 叶… II .. 叶… III .. 文学创作 - 文集

IV . 1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325 号

叶辛谈创作



作 者——叶 辛

责任编辑——张建一

封面设计——朱 也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 话：64515005 传 真：64515005

发 行——学林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 话：63779027 传 真：63768540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7.75

字 数——17.5 万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 7 - 80616 - 729 - 3/I · 270

定 价——13.50 元

目 录

关于长篇小说主题的思考

——摘自阅读与写作笔记(10则)	(1)
时间不是空白的.....	(7)
难忘的处女作	(16)
献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20)
遥远的猫跳河谷	(22)
当年知青的心声	
——《风凜冽》的创作	(24)
我和《蹉跎岁月》	(27)
写作三部长篇小说的前前后后	(36)
亦谈人物与情节	(49)
谈谈观察生活	(53)
人物分析琐谈	(59)
让文学和生活一同前进	(63)
那是忘却不得的	(67)
想象的魔力	(70)
千差万别的性格	(76)
我写《巨澜》	(81)
笔记本和学习创作	(93)
感情与色彩	(99)

花江坡看山	(105)
一个未圆的梦	(107)
从爱情说开去	(110)
《恩怨债》后记	(112)
亦谈文学走向世界	(115)
我曾是一个上海人 ——关于《家教》及其他	(118)
电视文学本,你姓什么? ——兼谈《家教》的改编	(127)
《闲静河谷的桃色新闻》后记	(133)
答《书讯报》	(136)
答《贵州工人报》——职工创作一席谈	(138)
脚踏着祖国母亲坚实的大地	(140)
写作《绿荫晨曦》之前	(145)
娓娓动听话写作	(147)
关于雅俗共赏的通信	(149)
让文学园地生气盎然	(151)
关于创作心理的对话	(153)
读《老屋》的随想	(161)
谈怎样结构长篇小说	(163)
从口味到影评	(171)
两性问题的思考	(174)
电视剧与故事	(178)
三个开头和三个结尾	(180)
坐在农家门槛上的沉思	(189)
长篇小说之我见	(192)
谈小小说	(201)
多观察、多思考、多阅读	

——怎样发现创作素材	(203)
《悠悠落月坪》题记	(206)
小说：带着感情从细微处着眼的叙述艺术	(209)
我写《孽债》	(212)
叶辛访谈录	(218)
《叶辛文集》第九、第十卷后记	(223)
历史才是鉴赏家	(226)
我为什么要写宋耀如	(228)
两副目光	(230)
文集的题外话	(233)
后记	(237)
附录	(239)

关于长篇小说主题的思考

——摘自阅读与写作笔记(10则)

一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人生活的意义在于什么?

看来这个始终萦绕在青春时期的题目又有重新思考的价值。

为了获取权力? 寻找自我的价值? 得到幸福无边的爱情? 摘取光焰不灭的艺术殿堂之一席? 还是利他, 为祖国、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

无论什么题材的写作, 看来都得解答这一问题。解答得肤浅、草率, 就会影响作品和人物的深度。

二

赎罪。

这是人生一个经常遇见的心理现实, 是一个挖掘不尽的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人称作催人泪下的社会悲剧, 被评论者认为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哲理小说。写的是拉斯柯尼科夫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以后的故事, 探讨的是这样一位人物

的灵魂最终是否能得到拯救。实则便是赎罪。

多少文学家选择了同样的主题。

人在一生中,故意或不经意或被迫或由于幼稚、盲目、虔诚、一时冲动犯下的过失、罪恶和不可饶恕的丑行,时时都在啃噬人的灵魂。这一心理在当代节奏迅疾的生活中将演化多少艺术上的悲欢。

关键在于寻找角度。

美好的事物和善良厚道的人在你的身边、在近在咫尺的距离时,人们往往很难认识它的价值;而一旦失去,人们才发现他有多么珍贵,且哀叹永远也不可能找回来了。难道这不又是一种心灵的赎罪……

三

对待邪恶的态度,是人生时常面临的课题。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和彼得·本奇利的《大白鲨》之所以永垂青史和畅销,同他们选择了这一主题并表达得栩栩如生不无关系。

以奇制胜,写恐怖的凶杀、写变态的心理感受、写露骨的色情、写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总显得软弱无力悲观厌世……固然可以吸引读者和畅销,但绝不可能有艺术生命力。

相反,在邪恶、罪孽面前探讨人的品质,是软弱、依附、假作不知、麻木不仁、奋起反抗、拼斗或是靠救世主出场解难,还是以集体的力量唤起民众去摧毁……显然这样的题旨要深远而经久得多。

电影《在码头上》从这一角度入手,据美国东部各码头实地调查一年的材料,由伯德·舒尔伯格编剧,名导演卡赞执导,一举获得八项金像奖,可以为这一观点作注脚。因为它选择的同样是对待邪恶的态度这一主题。

四

人在疾风暴雨般的骤变忽然降临时产生的狂热、惶惑、骚乱和盲动，以及这类骤变给人类（作品中的主人翁）带来的戕害，是经久不衰的主题。

面对这一类题材时，很容易使作家落入“套子”的诱惑。但只要搞得好，比如《哈姆雷特》，将使得整个作品多姿多采、扣人心弦，犹如奔腾的江河般澎湃激荡。

五

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迅猛进展，过去的事物连带它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演变甚至消亡。这样的现实要求逼使世界上任何角落固有的道德观念跟着有相应的、有时小有时又很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带给人物的，往往是悲愁和欢乐兼具，不少时候还常常是痛苦大于幸福。要使笔下常青，关注和研究变化着的生活是第一位的；没有这一条，长篇小说的构思和主题便会时常流产。

六

爱情被称作永恒的主题。

而被无数人纵情讴歌的尘世间的爱原是相互的、有限的、时常还是不牢靠的。难道这一道理不也是永恒的吗？

七

1989年5月，在承德听到吉祥天母的故事。照录如下：

吉祥天母亦叫福女天，在民间又呼作普渡母。她的形象丑陋得令人作呕。所铸铜像（存普陀宗乘之庙——外八庙之一）龇牙咧嘴，敞胸露乳，一手作假娇羞托于腮下，一手张牙舞爪举得高高。

颈项里套一串项链，项链上串着一圈骷髅。一前一后有两个人身妖头的小孩紧随她所骑的骡子，作呼唤状。

相传吉祥天母当姑娘的时候，是个十分美丽逗人的女子。她相当得意，交了一百多个男朋友，她的父亲对她的此种行径大为不满，愤恨地把她关了起来，欲加死罪。吉祥天母的母亲可怜女儿，趁父熟睡时，让女儿骑上一头骡子逃跑。福女天慌忙逃跑中，惊醒过来的父亲气急败坏地追来，张弓搭箭，欲射死女儿。不料一箭射去，正中骡子屁股，反刺激得骡子逃得更快。从此，吉祥天母骑的骡子屁股上竟然多了一只眼睛，那便是箭伤所致。

吉祥天母逃出父亲的魔掌，从此浪迹天涯，愈加放荡。为报复男人，开始吃人，吃了人之后就把人头串成项链挂在颈上。每食一人，她的脸便变得难看几分，吃人愈多，她就愈变愈难看。逐渐地变成今天我们所见铜像上那个鼓眼咧嘴，额头中间还长出第三只眼睛的残忍之相。

如此可恶的人，为佛法所感，竟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追悔中专门驱邪降魔，为以往之行径赎罪。

正在这时，海中有一兴风作浪、无恶不作之凶魔，谁都降伏不了它。吉祥天母主动找上门去，嫁给了凶魔，以便摸清凶魔秉性和妖法。她心甘情愿服侍凶魔七年，获得了凶魔的信任，成为凶魔的妻子，并在和凶魔共同生活十三年后，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到了第十三年终，吉祥天母趁凶魔高兴，将其灌醉，杀死，遂即骑上三只眼的骡子离去。却不料她与凶魔生下的两个半人半妖的孩子追了上来，连声惊呼：“妈妈、妈妈……”吉祥天母想到这是魔种，挥剑将两个孩子的脑壳砍落，催鞭而去。谁料那两个被砍落脑壳的身子，仍在急急追来，声声呼喊。吉祥天母心中不忍，随手抓起两颗被砍落的小妖的脑壳，按在追来的孩子身上。从此紧随她的两个孩子即为人身魔首……

故事有些离奇，回来就翻查《佛经故事选》，遍寻不见。心知这

故事已有民间传说的成分，遂记录下来。

凝神琢磨，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难道便没有类似“吉祥天母”的故事吗？

如果创作一部当代“吉祥天母”之传说，莫非不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主題。

八

死亡也是所谓永恒的主题之一。

不是因为死亡本身确有那么多的笔墨可以渲染，而是走向死亡的过程吸引着无数的文学家。“哈姆雷特之死”、“高老头之死”、“安娜·卡列尼娜之死”……如同雷蒙德·A·穆迪的《濒死体验》一书那样，描绘死亡过程的常常是精力充沛的活人。真正体验了死亡的人是永远也读不到描绘死亡过程的书的，哪怕这本书震惊了世界。

死亡被称为人类生命中最奥秘、最困难的课题，死亡本是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它的难以名状、它的种种感觉，它的回光返照，都以强烈的情绪和丰富的想象吸引着所有的艺术家，演员们演它，画家们画它，作家们写它，而它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则被放在其次的地位。人们只要求它让众人感觉到“真实”和“像”就可以了。

这是否亦从一个侧面阐述了艺术的真谛？

九

最充分生动体现主题的是感情。

不论是光线、色彩、声音、景物、情节、故事、情绪渲染、心理现实和所有的人物，如果不注入感情，那么只会让读者乏味。记不清是谁说的了：“那种用自己的作品给我们纲领中的现成原则作插图的艺术家，是蹩脚的艺术家。艺术家之所以可贵，正是由于他能提

出新的东西，能运用其全部直觉，深入到通常统计学和逻辑学所难以深入的领域中去。”

而全部直觉的调动和运用，靠的就是丰富的感情。康拉德说得好：“一切艺术首先都是同感情打交道的。”

十

挖空心思地寻找主题是徒劳无益的，这种寻找不但痛苦烦恼而且往往令人颓丧。玄妙高深且又浅显易明、朴素而“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主题，更难遇看起来表达能力很强的一些作家，这大约正是我们这个世界永远感觉缺乏杰作的原因。

不论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伟大的作家，留下多少光辉灿烂的名字和杰作。人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停止写作。在他们活着时或者逝世之后，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们还将不断地书写新作。同一地球上生活于同一时代同一世纪的所有作家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竞争，都在从不同的感受、体验、经历中寻找新书的题材。他们正在构思和写作的每一本书和出版的大量的用世界上各种文字印成的书，都会遇到一个主题问题。

那些有幸获得神来之笔的人们，必是勤奋刻苦的不懈追求者。让生活赐予一切有志于文学的人们的灵感和聪明才智吧。

时间不是空白的

水流湍急的猫跳河，在陡峭的崇山峻岭间急泻直淌；性情温顺的鸭池河，蜿蜒曲折顺坡流来。在两条河的相交处，形成一个特殊的三角地带。长江、珠江都有三角洲，猫跳河和鸭池河的相交处，也算得一个小小的“三角洲”，只不过这个小小的“三角洲”，既不像长江三角洲那样平坦宽广，也不像珠江三角洲那么富有热带风光。它有自己的特点，山峰奇秀，河谷幽深，闲雅、安静。自然，它和贵州山区许多深壑峡谷地区一样，偏僻闭塞，到了秋末之后，还有点儿荒凉。从贵阳发出的长途客车，两天才到这儿转一圈，只停留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带走不多的几个乘客。

尽管有些住在这儿的人们并不很爱这个地方。可我实在是很爱它。离开久了，还非常想念它。原因很简单，近几年来，我的中篇小说《峡谷烽烟》、《风中的雏鸟》、《情牵意连》；我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还有一些没发表的文字，都是在这儿写成的。

近一年来，无数的读者来信从各个地方转到这儿来，热心于文学的男女青年们，常在来信里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

这个问题我很难解答，因此好多来信我都不能答复，心中总像是欠着一笔帐那么不踏实。感谢《飞天》给我提供了这么一次机会，能让我和热爱文学的青年同志坦率地谈谈心。在谈心之前，我还重新阅读了近几天来收到的几十封来信。所以，我想，谈心的题

目叫作《时间不是空白的》，还是恰当的。

我出生在上海，黄浦江在那儿流入浩瀚的东海；苏州河污浊的流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太脏了。上海没有山，在我十九岁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山是什么样子。

我出生在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十六天，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像我同时代许许多多在上海长大的青少年一样，二十岁以前，我从未到外地去生活过。

中小学时期，我读了很多有趣的书。书本要我学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孩子，书本开阔了我的眼界，也陶冶了我的精神。书本中好多精彩的景物描写、格言警句，我都不厌其烦地抄录下来，同时写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体会，和我喜欢它哪些方面。自然，书本使得我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向往有山有水的环境。到十九岁的时候，上海南京路上嘈杂喧闹的人流，真使我不耐烦了。

大概是因为这些缘故，当命运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插队落户的时候，我选择了有山有水的贵州。上山下乡的生活，给我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画面。壮丽的山川河谷，山乡的风土人情，和上海绝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世代居住在偏僻村寨上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命运，像磁石般深深地吸引了我，萌发了我表现他们的激情。修建湘黔铁路的两年间，我生活在苗族聚居的清水江两岸、重安江畔，接触了许多少数民族，在和他们的摆谈、交往、共同生活中，了解到他们苦难的过去和今天的生活，熟悉了他们的风俗习惯，整天处在颇具特色的异域风光中，充满了新奇感。尤其是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贵州农村贫困的景象，山区农民古朴繁重的劳动方式，几角钱一个劳动日值，孩子们不能蔽体的衣服，年年春后需要靠救济回销粮打发日子的现实令我震惊和思索，更使我激发起学习创作的愿望。

在插队落户的集体户茅屋中，在铁路工地的芦席工棚里，我抽农闲、工余、清晨、夜里的时间，开始了学习创作的生活。白天的劳

动是累人的，生活是艰苦的，学习创作更是困难重重。在农村将近七年(六年又九个月。从1969年早春到1975年12月底)，我挑粪、耙田、铲敷田埂、钻进煤洞拖煤、在土砖窑上当小工、采茶叶、背灰，除了上铁路工地和后来教了一阵子书，只要是队里出工的日子，我都出工干活。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关于某某大学生下乡时从不出工，只知温课，某某拉琴的只知练曲，从不干活的奇闻轶事，似乎也张冠李戴到了我的头上。谢天谢地，我不是那样的奇才，因为我很清楚，当时发表作品要经作者本单位同意，你表现不好，本单位只要写上一行字，作品就别想发(事实上，出版社和电影导演后来确实来征求过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意见，开过座谈会)。劳动之余，我就练习写作。时间只要去挤，总是有的。赶场天，别人去赶场，我躲在屋里写；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在一起抽烟、喝酒、打牌、吹牛消磨时间，我找个安静处去写。晚上，我以床铺当桌子，坐在小凳上，点一盏自制的小油灯写。油灯摇曳的火焰，把我的帐子熏得漆黑，我也没工夫去顾及了。清晨，我也常搬条板凳，到茅屋的后屋檐下，拿一块搓衣板搁在膝盖上写。在贵州下过乡的同志都知道，村寨上农闲时，出工时间晚，每当这时候我就起大早，到村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那儿只有破败的四壁和缺胳膊断腿的桌椅陪伴我，非常安静。当初上铁路，我们的生活是“天当铺盖地当床”，每人发一根棍子和一张芦席过夜；吃饭是“上顿瓜，下顿瓜”，足足吃了两个月的老南瓜汤。我没闲心去整吃的、找住的，每天上班前、下班后带着一个小本子，去记录苗乡的地理环境、房屋结构，去问当地的苗家，坡上长的是什么树、林子里叫的是什么鸟、河里出产什么鱼、婚丧嫁娶时他们为啥要按如此程式办，当地流传着啥民歌，“摇马郎”时男女唱些什么，解放前这一带的山岭河谷是什么样的……问完了，我随便钻进其他连队、其他民兵团的工棚，往黑糊糊的人堆里一钻，倒头便睡。第二天一早，不待人家醒来，我又爬上山头，去看米色的稠雾如何从河谷里升起，去听雀儿如何开始

啼鸣，去望苗家姑娘们如何挑着担上坡去……这一些景象，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可谁能想到，就在这么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写出的长篇小说《春耕》退给了我；另外两本写铁路工地的书，也退给了我。在这三本书稿里，有我的心血，有我的追求啊！我失望得掉了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我还是默默地忍受下来了。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受到的挫折，一来是我要面子，我有自尊心；二来我牢记着“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人人皆知的俗话，即使在收到退稿的那一天，我也没有停止过练习写作。我相信我要从失败中迈出步子去。我自知文化水平低，我一个外地人学当地话味道总不对，我也明看到生活环境是苦的，创作条件几乎没有，我还是要干下去。

贵州历来有“天无三日晴”之说，气候总是阴沉沉的，把人的心情也弄得忧郁不乐的。伴随着退稿，从邮局看到大捆退稿的人，对我说起讽刺话来。有人还咒骂说，我要是能写出一本书，他的脑袋马上就可以落地；另有一些自命思想进步的人说，我这是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是极端个人主义，妄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还有一个集体户里，有我的几个好朋友，因为另外几个知青说了嘲笑我的话，争执起来，险些打架。事后我听说了这件事，对我的好朋友说，你别去跟他们打架，让他们说我好了，说得越多越好。这不是我今天来打“马后炮”，我当时确实是那么讲的。真要谢谢那些说风凉话的同志，当时他们要说，我还没那么大的劲头继续学习写作哩。

除了人为的讽刺嘲笑，还有物质上的压力。我插队的寨子工值低，一年到头出工，扣除口粮款，没几块钱可进。有好多次，我没有买煤油的钱；有无数次，我没稿纸，不说农村没稿纸卖，商店里有信笺，我也买不起。天天练习写东西，一本信笺经不住我写几天。修建铁路时，我省下一点钱，经常拿来买煤油；感谢我那些在上海的老同学，他们一年到头要给我寄出无数的稿纸。

报刊上发了报道我的消息，青年朋友们容易注意到我已经发的东西，很自然地忽略了我的挫折。

其实，当受到这些精神的和物质的压力时，我的心情是抑郁的，情绪是低落的、烦躁的。但在那种时候，我仍坚信，挫折不能迫使我不写，我非要写下去不可。电影文学剧本《火娃》头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三天时间写出来的。

就在这样的生活里，不断地感受生活，不断地往格子里填字，伴随着我一天一天走过来。我也一天一天地逐渐找到了表达的方式。

时间，不是空白的；空白的是稿纸。

看，这儿还是我插队落户时的土地，寨子仍然遮掩在绿荫丛中，微翘的屋脊在繁茂的枝叶间显出它的曲线，门前坝的青㭎林子，仍是翠绿的一片。甚至寨前那条从水库引水来的沟渠，一点也没变样子。那座有一块石板晃动的小石桥，我的脚踩上去时，青岗石照样颤动了一下……

啊，几乎什么都没有变。

十二年后的今天，为了新写一本小说，我又来到当年插队落户时的地方，不由感慨万千地想着。

十二年过去了，难道当真什么变化也没有吗？

不，时间不是空白的。

当我走进寨子，遇见一个一个熟人，和他们在台阶上、大树下、小桌边坐下闲聊的时候，我才深切地感到，山寨上的变化有多么的大。

我插队的年月里，这儿干活兴施大帮，你看我，我瞅你，出工不出力，谁也不卖劲儿。过了春节，大队干部去公社、去县里开会，就向上反映，要求拨救济粮、回销粮。

如今呢，寨子里搞起了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早几年要一个多月才栽完的秧子，这会儿十来天就栽插完了。寨上不但没人喊“锅儿